

趕新聞遊戲下的「真實」：
攝影記者的勞動處境與專業焦慮

潘俊宏*

投稿日期：2009年10月3日；通過日期：2010年2月5日。

* 作者潘俊宏為《聯合報》攝影記者，e-mail: pch0221@gmail.com。

《摘要》

本研究採批判性視野，以質性研究的「參與觀察法」與「深度訪談法」探討攝影記者的勞動過程，分析報禁解除後，攝影記者的勞動處境與專業倫理意識型態。研究結果發現，新聞專業倫理隨著新聞商品化逐漸淪喪，進而使攝影記者失去職業主體性，並擺盪在勞動者與專業者的泥沼中。

藉由攝影記者的勞動經驗分析，指出專業勞動者若沒有相對應的勞動條件保障專業，專業價值只能是商業利益的交換價值，甚至會進一步壓迫與剝削專業勞動者。

關鍵詞：工作倫理、專業主義、專業倫理、勞動過程、攝影記者

壹、攝影記者為何而戰？

四處奔波趕場的攝影記者，總愛賣命和時間競賽，新聞影像在他們心中烙印下何種意義，恐怕只有當事人知曉。

攝影記者若在趕新聞過程發生意外，則引起社會關注。如《聯合知識庫》記載著：「因為採訪颱風現場而殉職的台視記者平宗正，留給同業的最後身影是，他站在湍急的洪水中，奮力把攝影機高舉肩上保護，努力要完成採訪任務，卻不敵兇猛洪流，不幸殉職。」（張源銘、張文輝，2004年10月26日）。這種為拍攝「真實影像」的高度使命感與敬業精神，往往成為感動社會人心的攝影記者形象。另一方面，台灣媒體亂象廣受社會批評。有時攝影記者侵犯人權或隱私的行為，亦常被學者和輿論指責。攝影記者這麼不專業的形象，很難與上述具高度工作使命感的形象連結起來。

許多針對攝影記者研究的文獻都指出，台灣媒體的發展，先後受到政治力與商業的干預，攝影記者在工作場域內的弱勢與地位遭矮化，宛如新聞快遞卻沒有勞工意識（許靜怡，2002；黃義書，2004；鍾宜杰，2006）。令人好奇結構性的力量如何讓缺乏勞動意識的攝影記者同時具有高度敬業精神？一般而言，敬業精神是各行業老闆對員工、學校對學生、甚至是同業間相互傳授或競相表現的職業倫理，這種倫理背後是一種價值觀的展現。就像台灣新聞記者協會（記協）網站，指出記協成立伊始就致力推動「新聞倫理公約」運動，¹作為彰顯專業主義的行動，並塑造專業身份的認同。記者的「專業主義」或「專業倫理」不能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存在，即使是為公共利益服務的專業倫理也是在特定條件下產生。

我的研究發問源於攝影記者敬業精神與「不專業」表現之間的矛盾，引發的問題：工作價值是來自社會所信賴與傳承下的新聞專業倫理，或是由媒介科層組織所形構的工作倫理？進而使攝影記者甘願投入新聞生產的是什麼價值？這兩個問題都要回到攝影記者勞動過程與其相對應的社會關係來探究。

新聞影像之所以能取信閱聽人，是因為眼見為憑的意識型態。為防範新聞影像遭修改造假，故需要新聞專業倫理的規範；這種專業倫理維繫支撐了媒體與閱聽人眼見為憑的意識型態。雖然新聞影像的產製過程充滿價值判斷的選擇，新聞產製過程仍需專業倫理的規範，否則會喪失媒體與新聞影像的公信力。

許多研究都忽視新聞工作者面對的各種社會關係對專業意識的影響。劉仲冬（1998: 86）提到專業倫理的社會控制有一種是內在的個人態度及價值。以「專業倫理」討論記者的專業精神時，是否成爲一種社會控制？本研究試圖釐清爲公共利益服務的新聞專業倫理，在商業媒體中如何內化到攝影記者身上，甚至被挪用或改造爲攝影記者的工作準則。攝影記者本身又存有什麼專業意識與專業主義所產生的行動，去對應所處社會的權力動態關係，進一步形構出工作認同。

貳、攝影記者勞動主體性形構文獻探討

許多針對台灣攝影記者的研究指出新聞影像的意義與生產者脫離關係（許靜怡，2002；黃義書，2004；鍾宜杰，2006）。數位科技的發展使攝影記者有去技術化的危機感，這種危機感讓攝影記者更服膺管理階層的工作倫理，使自己的構想與執行逐漸分離。正如 Braverman（1974）指出，「去技術化」是資本主義的發展趨勢，資本家剝奪工人

的工藝知能與自主控制權，減低從勞動力（labor power）到勞動（labor）的不確定性。

Burawoy（1979／林宗弘等譯，2005）的研究進一步指出工人的主體意識如何在勞動過程中產生，證明勞僱雙方的利益可透過某些機制形成生產共識。攝影記者勞動過程的社會關係遠比工廠工人複雜，這些不同社會關係的利益如何獲得協調則是場域鬥爭。引用 Bourdieu（1983）的生存心態（habitus）概念，² 剖析攝影記者如何認知自己在勞動場域中的位置，以專業主義為自己累積各種資本，做為階級鬥爭的籌碼。

鍾宜杰（2006）關切政治、經濟、文化等社會層次的改變對攝影記者產生的影響。指出戰後台灣新聞業是國家政策扶植與管控下的特許行業；攝影記者的階級意識為社會菁英。解嚴前後的世代正好是攝影記者面臨從政治力干預，轉換為商業利益壓迫的時代；當時他們脫去社會菁英的想像，以文人雅士自居。隨後數位時代的商業媒體又自認為是攝影快遞，勞動工人的階級意識較為鮮明；這三種不同的想像認同是受到媒體場域環境的相互形構而成。我則關切不同世代的攝影記者如何產生認同的轉變？為何攝影記者依然臣服在壓迫的勞動體制下？

尤其報禁解除時的媒體產業結構、政經勢力的消長與接合，讓當時的攝影記者具新聞專業使命感；雖居處編輯部弱勢的結構位置，仍以較強的能動性與專業意識投入工作；常以「偷渡」照片的方式進行場域鬥爭，呈現具個人風格的新聞攝影。攝影記者以此展現專業、製造差異與變化，建構自己在新聞場域中的位置及觀點，並累積自己的文化資本。但對新聞場域而言，新聞影像的價值遠不及新聞文字；大部分媒體以文字思維要求攝影記者配合產製相關的真實影像，弱化攝影記者對新聞影像的詮釋與自主判斷，使其產生工作主體性的認同焦慮，並反映在靡茫的飲酒文化中。因此當時許多攝影記者選擇離開新聞圈，有的走上藝術

創作的道路爲自己累積更具價值的文化資本，有的選擇自行接案來累積經濟資本。

林富美（2006）關切新聞工作者世代差異，指出新聞商品化後，以經濟爲基礎的市場競爭所建立的報償制度，形塑了場域鬥爭的評比規則與框架，以此激勵個體勞動者行動並產製績效。通過金錢、職位升遷、工作權的中介控制記者，也把勞僱間的權力關係制度化。媒體組織透過報償制度所建立的勞動交換關係，對個體勞動者更能形塑生產共識，發揮規訓與收編之功效。不同世代的記者之生存心態因場域的不同位置而殊異紛歧，新聞專業的價值也在世代交鋒中發生質變。本文即剖析從報禁解除後到《蘋果日報》來台對攝影記者的專業如何產生質變；攝影記者因世代的差異與場域的不同位置而有不同的專業主義與主體認同。

另外，科技、科技物的發展成爲當今傳媒產業競爭的基礎。媒體因應數位化的產製流程與產業發展，使攝影記者必須走出傳統暗房，重新學習數位相機與電子暗房的技能（Becker, 1991; Liu, 2006）。但無論是傳播技術、數位相機、電腦自動化設備、以及通訊器材等科技物，在新聞產製中構成綿密的權力網絡，改變攝影記者的生產技術、人際關係，進而改變了生產關係。

因此，攝影記者的攝影專業在新聞場域中有相互糾葛的複雜社會關係，並形成一種動態的權力結構，林崇熙（2004: 123）稱此現象爲弔詭的技術；技術不僅是人們對外展現的控制力量，同時也是對人們的控制性力量。攝影記者鑲嵌在這種社會脈絡中，會採取什麼樣的專業意識，對應媒體管理階層與採訪對象的動態權力結構；技術物對攝影記者有什麼樣的意識型態效應與內涵，必須在攝影記者的勞動過程裡考察。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質性研究的「參與觀察法」與「深度訪談法」探討攝影記者的勞動過程，分析商業媒體下攝影記者的勞動處境與專業倫理意識型態，進而指出專業主義的內在矛盾。

訪談對象的選擇則考量《中國時報》、《聯合報》、《自由時報》、《蘋果日報》的不同編制。《聯合報》攝影中心的編制，區分為政治財經新聞類、綜合新聞類（底下又獨立出民生消費小組、影劇新聞、體育新聞）；《中國時報》將影劇新聞的攝影記者獨立於攝影中心之外，攝影中心則沒有路線的區分，但近幾年有人專責消費新聞的採訪；《自由時報》攝影組沒有區分採訪路線，但是影劇藝文與吃喝玩樂週報則獨立於攝影組之外；《蘋果日報》登台後，該報嚴格區分出跑一般時事新聞、財經新聞、娛樂新聞、體育新聞、民生消費與生活的副刊新聞、突發新聞等不同採訪路線的攝影記者。

《中國時報》、《聯合報》、《自由時報》（以下簡稱三報）的攝影記者支援其他採訪路線的機會大於蘋果。所以採訪對象的選擇盡量以跑過各類型新聞的攝影記者為主，依各報的任務編組各選取一名攝影記者。很多攝影記者從入行到現在很少只待過一家報社，訪談時就從其職業生涯談起，每位攝影記者曾跑過的路線經驗也都納入田野資料。四報共 17 名受訪記者的資料則列於附錄一。

肆、研究結果

一、趕新聞遊戲

本節主要探討傳媒產業的結構變遷如何影響編輯部的產製方針、帶動組織變革、進而改變攝影記者的專業養成。這不僅是市場化與視覺化的產業趨勢，還有科技發展與在媒體內如何被應用的歷史脈絡，深深左右攝影記者的工作型態與樣貌。

(一) 市場化與影像優先的新聞產業趨勢

科技帶來資訊的快速與即時性，市場競爭迫使第一線的記者經常趕新聞、衝現場。但新聞影像的價值仍須建立在讓閱聽者信賴的基礎上，最低標準為追求真實的專業倫理。報社以此要求攝影記者趕新聞，除了避免漏新聞，也為搶獨家。

視覺化的趨勢讓報紙更重視照片的版面呈現，但各家報社對攝影部門的編採作業流程無太大變革；攝影記者依然是採訪單位的配合者，對版面內容呈現的自主權相對較小。

因此，報禁解除後，三報攝影部門主要是支援不同路線的文字記者拍照。攝影記者喜歡拍攝具換喻（metonymy）、隱喻（metaphor）等具個人風格的影像，³ 展現有別於文字的新聞攝影專業。《蘋果日報》創刊後，凡事要求有圖為證，攝影記者被要求拍新聞發展細節；同時該報建立讀者會機制迎合市場，D3 就說：「讀者有看法我們就往這方向走」（筆者訪談稿整理，2008年11月5日）。《蘋果日報》還提高攝影部門的生產權力，可以和各版的編輯、美編、文字部門等共同討論版

面的呈現；組織編制與運作原則為「沒圖沒真相」。反觀三報，攝影部門在組織內參與編採作業的權力沒有大幅提升；面對市場競爭，皆以節流方式整併資源，對人力作有效運用。

《蘋果日報》這種組織變革，使照片的價值更獲得編輯部的認同，賦予攝影記者見證新聞現場的權力；但攝影記者在組織規訓下，弱化攝影記者對新聞現場的判斷與詮釋，改變攝影記者的養成訓練。

（二）觀視主體與實做分離的照相工人

1. 組織變革與編輯台權力下的記者勞動規訓

《蘋果日報》創刊前的社會新聞，通常由新進的攝影記者專責監聽一一九無線電勤務，自行判斷突發事故的重要性。攝影記者從中培養新聞敏感度與判斷能力；為求時效經常闖紅燈、趕新聞。因此被支配的攝影記者如何表現主動與負責的工作態度，成了長官考評的重要指標。

各報每天都會檢討報紙 A 落的新聞。當編輯部高階主管將比報缺失或報社政策傳達給攝影部門後，主管轉而建立規則要求部屬遵守。有的長官以獎金鼓勵部屬，但報社營收持續下滑，管理階層改以績效評估淘汰不適任記者；於是記者以「不求獨家，只求不獨漏」來明哲保身。

因此，攝影記者逐漸體認到攝影部門在組織內的權力有限，個人職涯發展也相對有限。雖然如此，各報還是有人汲汲營營求表現；這樣的人會成為榜樣，強化組織規訓，豎立典範讓其他員工跟隨。所以，有的攝影記者為適應職場生存，對新聞的判斷與爭議就交給長官負責。

《蘋果日報》攝影部門的大主管會參加高階主管「鋤報」會議。⁴ 鋤報結果層層追究下來，對各部門產生壓力，對犯錯的記者施以口頭告誡、扣薪、或直接資遣等懲罰。跑了十多年新聞的小主管 D3 就說他進

蘋果一年多來唯一學到的就是「你永遠無法判斷你犯的錯是大錯還是小錯」（筆者訪談稿整理，2008 年 11 月 5 日）！從上到下只需戰戰兢兢做好自己的工作，攝影記者不用判斷新聞價值，只要滿足編輯台的需求就好。

所以，各報對攝影記者的規訓是要配合組織的生產機制，再現各種真實影像增加市場競爭力。在市場化與視覺化的產業趨勢下，新聞影像的經濟價值提升，《蘋果日報》賦予攝影部門較高的生產權力，以編輯部集體決策、生產的機制規訓、弱化攝影記者的專業自主性，使新聞攝影的專業產生質變。讓攝影記者面對工作環境中的各種社會網絡時，產生不同的專業主義與職業主體認同。

2. 四處趕場的高能獵影師

(1) 採訪關係下的專業主義

通常採訪對象可直接、或間接透過幕僚與公關告訴文字記者訊息，形成一種形式上內聚的採訪生態。攝影記者身處其中，會以較具侵略性的相機展現專業，以有限的自主性拍照。

搶拍自然發生的新聞常是攝影記者趕新聞的目的。若採訪對象為公眾人物，攝影記者通常謹守不介入新聞事件的分際。

因為我去拍他們，感覺就必須要在一個客觀的立場，而不是我去介入他們，所以我會站在旁邊，冷眼旁觀（A1／筆者訪談稿整理，2008 年 10 月 15 日）。

攝影記者的冷眼旁觀養成捕捉瞬間影像與預判能力的專業。但有些採訪對象會臆測攝影記者的意圖，以誇張的神情、肢體動作來滿足攝影記者的需求。為突破公眾人物的作秀，《蘋果日報》以跟監偷拍的方式取得獨家影像，並將這種 know-how（技能）神秘化來塑造攝影記者的

專業。

若採訪對象非公衆人物，有些攝影記者會尋找可突顯議題的影像。若有同業以引導、安排的方式讓受訪者配合演出，則大家的閃光燈就會此起彼落的閃爍，一同提早收工交差、賺取一日所得。

當採訪對象認為文字記者具較大的權力時，往往產生對文字記者與攝影記者「大小眼」的情況，尤其以消費與影劇新聞特別明顯。跑此類新聞的 C3 就說：「有時候到現場，當燈光架起來的時候，店家就會說：好專業哦！」（筆者訪談稿整理，2008 年 11 月 26 日）攝影記者在此類採訪對象面前，以器材來呈現專業形象以方便工作。

許多採訪對象或公關一律謙稱攝影記者為「攝影大哥」或「攝影師」。有的攝影記者對此稱謂不以為然，認為攝影記者比起攝影師而言較具工作使命感，不會汲汲營營個人利益而卑恭屈膝。後來有的攝影記者逐漸覺得在這種採訪生態中確實扮演攝影師的角色；雖能得到採訪生態的肯認（recognition），卻會產生攝影記者或攝影師等工作認同的游移。

許多採訪對象或公關為包裝新聞內容，還會請熟識的攝影記者操刀拍照，既可發通稿給所有跑線的文字記者，也藉機拉攏和攝影記者的關係。這種檯面下的公開行為統稱接 case（個案）。由於其中夾雜著人情與彼此利益的糾葛關係，使攝影記者接 case 時頗為低調。

由此可知，攝影記者雖握有運用視覺語言、思考、賦予訊息意義與價值等處理影像訊息的文化資本，但這種文化資本卻受制於編輯部的訊息處理裁量權，從新聞訊息的來源、過濾、呈現都從屬於文字體系；很多熟悉這種權力運作關係的採訪對象會反制或滿足攝影記者的需求。攝影記者則秉持專業的反身性倫理展現專業主義，考量採訪場域內的權力關係與影像的價值，適時以專業攝影知能及新聞敏感度和採訪對象幹

旋，以獲得採訪生態的肯認。攝影記者會為自己尋求有利的場域位置完成工作、累積資本。

(2)同業與同僚間的專業競爭

甲、同業間的競爭

攝影記者各種資本的積累需以保有工作權為前提。對跑相同路線的攝影記者而言，基本上以先求有照片再求好照片為原則。但有時新聞現場欠缺規劃就會失去採訪紀律；為求不漏畫面的壓力讓攝影記者彼此以身體衝撞卡位，混亂的場面讓受訪對象不知所措或產生反感。在競爭壓力下展現純技術工人的形象。

另一種求好照片的競爭是依經驗判斷拍照時機與卡位。老一輩的攝影記者將拍照時的想法與創意當成自己的專業展現，競爭的壓力讓現在的攝影記者不注重這種專業展現。攝影記者有時私下與同業進行分工合作、或彼此調片，以免無法對報社交差。

攝影記者對新聞的判斷與對專業的認知會在這種環境中逐漸減退，慢慢轉變為依靠勞力的工作，接受工作倫理對專業的規範。

乙、攝影記者與文字記者、編輯間的專業競爭

有的攝影記者認為，有些文字記者以為影像必須配合文稿、或要不要派攝影由文字記者決定。對此有些攝影記者會依版面需求進行專業反抗，例如攝影記者有時會自己尋找資訊，主動拍攝具視覺性的影像並詮釋意義，以圖文的方式呈現於版面，展現對工作的專業自主性。至於攝影部門的長官大多會靠監看電視 Live（現場轉播）主動派員出擊。當過長官的 C2 表示，這只是證明攝影記者的自主性，不受文字記者的指揮；意含著在組織內爭取權力與對攝影部門的肯認。攝影部門的這種努力，有時卻成為趕新聞的驅力。

新聞畢竟需要經營才能深入了解脈動，可是文字記者與採訪對象建構出來的採訪生態，常常不是臨時任務編組的攝影記者所能融入的。不對等的權力關係幾乎各個路線都有，D2 就形容文字記者與攝影記者外顯的階級差異：

我有去拍過米蘭跟巴黎時裝周，文字記者他們都會寄邀請函到他們住的飯店去，有的品牌就直接把包包送到房間去，然後他們去看秀時，就像一位貴婦穿的漂漂亮亮的，喝完咖啡再去看秀，而攝影記者卻必須在一個多小時前，扛著攝影器材與梯子雪地中排隊（D2／筆者訪談稿整理，2008年9月29日）。

攝影記者面對階級差異與不平等的關係，皆以專業主義進行場域鬥爭。在不可預料的新聞會服膺攝影部門的指揮調派，力求在弱勢分工模式中展現專業；在影視消費等新聞上，則強調攝影技能與創意的專業性。所以，記者的專業權力依附在生產權力之下；各報攝影記者專業的展現有時是一種組織權力運作下的標準化行爲。這種社會關係促使攝影記者甘願服膺管理階層的生產共識。

對照片的選擇，編輯台往往依照文稿的觀點選取圖片，形成以圖配文的生產慣例。當過圖編的攝影記者 C1 表示，他會應用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打破部門間權力圍籬的門戶之見；但 C1 坦言這樣的效果有限。

攝影記者向編輯展現專業的另一種形式是圖說。有的攝影記者會想辦法以精簡的圖說帶出該影像的精髓與要表達的觀點。但圖說對《蘋果日報》而言是不被重視的，該報長官甚至認為拍攝者的名字也可省略，和編輯的溝通與把關是長官的工作；昔日攝影記者以見報累積名聲來取得象徵資本，卻在新聞商品的建構過程遭剝奪，使得專業養成也產生質

變。

丙、攝影部門內與同事的競爭

對不分線的攝影記者而言，會在不同的工作環境建立不同的專業認知，認為主跑影劇消費線的同事非正統新聞攝影。但影劇消費線的攝影記者則認為不分線的攝影記者無法掌握人脈與知識，且影像建構的創意需要磨練與學習。這種專業主義的競爭其實是架構在不同採訪環境下的生存心態，可累積不同的資本，及獲得採訪生態的肯認，卻不知不覺成為攝影記者的優越感競爭。

這兩者的專業競爭在工具化的趨勢下逐漸降低。經營管理者希望攝影記者配合組織內的產製流程，讓攝影記者在工作表現上相互競爭。例如《蘋果日報》的突發中心可以在重大新聞上和各路線的攝影記者作競爭。這種競爭也有助於管理階層的規訓並形成生產共識。

總結而言，報禁解除後攝影記者一度想建立職業主體性，秉持從歷史傳承下的新聞專業倫理追求專業自主。新聞商品化後的組織勞動規訓，使第一線的攝影記者變成沒有主體性的拍照工人；新聞攝影必須符合報社的規範與利益，使專業的價值產生質變。攝影記者依不同採訪生態與報社的需求，對影像的真實有不同的標準；有些新聞路線可以進行紀實攝影的藝術創作、有些只是純創意攝影的舞台。攝影記者在同業、同僚間的競爭下，會以不同的專業主義爭取職場內的生存與權力，並打破不平等的社會關係來提高資本積累。

除此之外，科技的發展與攝影記者倚重的攝影技能，也是造成觀視主體與實做分離的原因，以下將探討科技發展與攝影記者勞動過程的關係。

（三）數位技術發展與勞動過程

「速度」不僅提供趕新聞的趨力，並賦予科技物政治性格，迫使攝影記者改變攝影技術與專業意識，偕同架構趕新聞的權力關係網絡。另一方面，媒體會以商業利益選擇需要什麼效果的新聞影像，並規範攝影記者的技術養成；這就是攝影技術的內在政治性格。以下就探討攝影技術內在的政治性格如何與媒體商業利益相契合，進而與勞動體制的權力關係網絡相結合，一起架構趕新聞遊戲，並影響攝影記者的意識型態內涵。

1. 商業媒體下的攝影技術

最初將攝影技術應用在媒體的時候是一門專業技術，因此入行門檻高。解嚴後報導攝影興起，在勞動體制較弱勢的攝影記者喜歡用隱喻、換喻等意境式的影像表達與文字不同的觀點。商業媒體的競爭思維卻不允許攝影記者這樣拍照，它會選擇某種攝影技術為資本家服務。第一，以最低的生產成本創造最大的產值；也就是在管理上發揮攝影記者最高的生產效率。第二，創造新聞商品最高的價值；經營管理者在乎的是新聞影像的效果，而不是新聞影像的意義如何為公眾利益服務。這兩點在四家報社的組織編制、及目前攝影記者的拍攝手法上可以一窺端倪。

在報社組織編制上，三報以節流方式控管生產成本，運用最少的攝影記者跑新聞；《蘋果日報》的影像需求量大於三報，攝影記者人數雖多但工作量大；於是要求攝影記者要「直觀」攝影，只要將所見的影像拍攝清楚就好。這種拍攝手法在新聞商品化的趨勢成為主要攝影技術。

「直觀」攝影的技術在相機普及後降低技術門檻，更方便管理階層的規訓。

在新聞商品的價值上，版面呈現越來越注重影像的效果。《蘋果日

報》最早引進「打光棚拍」的攝影技術呈現新聞影像，以美化新聞商品。隨後各報紛紛跟進，借重攝影記者的視覺語言能力，以創意建構影像效果。這種攝影技術不同於社會傳承下的新聞專業倫理，會混淆攝影記者對新聞真實再現的專業意識；但透過工作倫理的規訓，可讓攝影記者產生新的工作認同。

2. 技術權力網絡下的社會關係

Feenberg (2002/韓連慶、曹觀法譯, 2005: 18) 表示「技術」具有雙面性，當技術的操作者和對象都是人的時候，技術的行為就是一種權力的實施。攝影記者為搶時效或彌補相機的限制就用安排的，採訪對象也大多能配合演出。

那時候我們拿拍立得還很好玩，他不能動，人稍微動一下就毀了。……所以要成功就要請採訪對象配合我 (D3 / 筆者訪談稿整理, 2008年11月5日)。

即使是拍立得，攝影記者握有相機，就有權力在採訪場合展現專業。但回到趕新聞的勞動體制，則又充滿委屈與無奈。

以前各報的攝影記者都會在幾家特定沖印店洗照片。彼此聚集聊天、互吐苦水、或調片。許多扭曲的採訪關係與對勞動體制的不滿因此得到宣洩。同業間彼此進行良性競爭，一些資淺的攝影記者易感染對工作投入的敬業精神，自然容易跳槽到大報。這種跳槽成了攝影記者職涯向上流動的機會。

以沖印店為中心的交流網絡，某種程度讓攝影記者形成對工作意義與專業的認同。透過同業間相互肯認的感染力，促使攝影記者盡力追求工作自主與使命感，以此抵抗在編輯部的弱勢地位。職業主體在資深前輩帶領下，形塑出專業倫理讓後進者跟隨。這種專業倫理夾雜著工作倫

理，將工作視為第一優先。攝影記者誤認為這樣的努力可以改變新聞場域中的階級位置與資本積累，合理化對勞動規訓的共識。

數位化後的攝影記者遭具政治性的科技物去技術化，攝影記者必須透過學習數位科技再技術化。傳呼機、行動電話等科技物相繼問世後，攝影記者不用每天回辦公室，與同事情誼疏離，逐漸消弭資深與資淺的差異性。經營管理者運用數位技術打造出個體化與彈性化的勞動體制，更方便重新建構符合商業利益的技术權力網絡。且數位科技讓影像造假更容易，編輯部對影像的把關若與攝影記者認知差距太大，攝影記者會逐漸輕看專業倫理，新聞記者的職業認同也下降。加上不同路線的差異化採訪生態，讓攝影記者的專業認知處在動態的游移中。

其次，這種勞動體制使攝影記者的生產技術改變。從前的攝影記者從拍照、沖片、挑片、寫圖說都是獨立完成，對新聞的詮釋與觀點還能保有些微自主性；現在的攝影記者只要負責拍照，無須涉及照片的意義詮釋。生產技術的改變促使生產關係改變，強化工人的身份，進一步支撐起權力下的關係網絡。

3. 科技物的政治性與意識型態效應

攝影記者 D5 表示入行時為訓練自己掌握快門的時機，以打電玩訓練自己看到歹徒時只發射一發子彈。這種在實做中養成的攝影技術，還必須自我判斷拍攝重點；但在編輯室的主控下，要求攝影記者多發稿且不要漏畫面；也就是從依靠攝影記者拍攝決定性瞬間影像的功夫，更多轉移到編輯室對影像的需求與處理的裁量權。數位科技的發展加深這種指揮控制的社會關係。攝影記者要積極學習數位技術，才能保有工作權。同時，數位傳輸的發展讓隨採隨發成了工作上的常態。這些科技物的發展驅使攝影記者更投入趕新聞遊戲。

所以，技術的權力關係網絡會加強攝影者純勞動意識，只要能完成工作賺取工資就好；同時，攝影記者也積極再技術化來保有專業者的身份與工作權。

數位科技的發展好像促使攝影記者的專業知能改變，卻往往讓人忽略促動這種改變背後的技術／權力關係網絡。所以有必要探討攝影記者所秉持的專業倫理意涵如何在歷史與社會的脈絡下被塑造，使攝影記者產生不同的專業主義與工作認同。

二、影像真實的再現政治與專業主義焦慮

以下先以報禁解除後到《蘋果日報》進入台灣為一個歷史階段，這個階段的攝影記者具有掌握真實即正義的攝影使命感；第二階段為《蘋果日報》進來後的報業變化，讓攝影記者重新界定許多新聞路線的專業倫理。這種專業倫理的轉換受到市場商業力、勞動規訓、與工作現場的社會關係所影響，進而操弄專業倫理與真實再現的論述，使攝影記者捨棄個人正義的使命感，轉而追逐具有利益的影像。

（一）掌握真實即正義的攝影使命

台灣的解嚴與民主化讓採訪環境與社會脈絡產生變化，使攝影記者有較大的拍照空間。有些攝影記者的工作熱忱與報社薪資無關。

有一次我連續七天夜宿忠孝西路，……雖然那時候有排班，可是我們都怕錯失，沒有人願意回家睡覺。都怕回家睡覺之後剛好是要驅離而錯失了那樣的採訪（D4／筆者訪談稿整理，2008年11月16日）。

捕捉真實的再現，成了攝影記者的專業展現與工作成就感。B2 直言：「那時候的使命感就是要做標竿」（筆者訪談稿整理，2008 年 10 月 8 日）。版面呈現與被同業肯認的成就感，為自己累積好名聲。

可是攝影記者的工作無法由自己掌控。人力吃緊的小報，大多以職場資歷傳承專業理念；職業團體在追求真實的專業倫理下被凝聚。強調工作倫理的大報認為新聞隨時會發生，要先有勤奮的敬業態度，才有可能跑到符合專業理念的真實新聞，所以工作倫理必須凌駕於專業倫理。很多攝影記者處在這種趕新聞遊戲中，慢慢覺得這不是一份可以成爲一輩子的志業。所以《蘋果日報》運用高薪挖角策略與追求真實及伸張社會公義的理想，讓許多攝影記者甘願轉換跑道；而且擴大攝影部門的生產權力，也使攝影記者認為這可能是一種向上流動的機會。

（二）商業利益對攝影真實的再界定

《蘋果日報》進來台灣後，爲求版面視覺效果，需要大量眼見爲憑的真實圖像；有時需要攝影記者安排、建構真實影像，有時依靠編輯營造效果。

這種需求讓攝影記者必須採細節式的「直觀」攝影。市場的競爭與勞動規訓讓其他三報的攝影記者跟進，逐漸弱化在新聞現場的判斷力，並放棄昔日爭取專業自主的意境式攝影；這種改變可從今昔的配圖攝影看出來。而攝影記者的視覺性主觀意見轉而展現在建構真實的棚拍攝影，以此爭取較平等的社會權力關係。

1. 從跟監偷拍到自然真實的直觀攝影

壹傳媒高舉追求真實即正義的新聞倫理去衝撞採訪生態。但對執行任務的攝影記者而言，其過程常讓自己深入險境，也屢屢發生侵犯隱

私、人權等具爭議性的拍攝手法。這類偷拍直擊的影像成爲某些新聞的真實樣貌。《蘋果日報》創刊初期因爲跟監偷拍惹上不少官司，該報因此嚴格要求文字記者落實查證功夫。藉由專業倫理論述強化工作倫理，要求攝影記者只需直接拍攝自然呈現的影像。

蘋果的狗仔文化帶來市場利益，演變成其他三報以假偷拍的方式來生產影劇新聞；既符合報社的利益，也達到藝人曝光的需求。攝影記者穿梭在各種新聞場合拍照，管理階層從中取得具故事性與市場利益的真實影像，尤其在有限時間內要求攝影記者生產出配合文稿的「配圖」，佐證文章的可信度並增加其可看性。

2. 配圖攝影

報紙的新聞呈現除了當天發生的事件外，還有各種專題分析或深度報導。許多抽象與複雜的資訊可透過統計數據與文字的堆砌組合來表達，卻難用單張照片如實呈現新聞深度；可是「真實」的影像卻能訴諸閱聽人的感覺與感官，達到快速傳播與眼見爲憑的效果。

所以報社需要攝影記者產製可以配合文稿的影像。昔日許多攝影記者以意境式的影像讓某種現象與議題能夠更突顯，而《蘋果日報》卻要求攝影記者只需直觀攝影就好。

3. 打光棚拍的創意攝影

商業媒體爲市場利益運用安排、設計、建構等技術再現真實影像。一些採訪對象也會利用媒體公器達到廣告行銷的目的。這類具廣告效益的新聞，需借重攝影記者的專業達到視覺傳播效果。因此，攝影記者在攝影棚內獲得建構真實的權力。

有些攝影記者以此獲得採訪生態較平等的權力關係，進而以更大的寬容度接受建構的真實再現，不是眼見爲憑的非黑即白，而是有許多牽

涉到判斷與詮釋權力的灰色地帶。攝影記者為求生存而會轉換「真實」的政治界線。

（三）真實之為利益與真實之為正義角逐下的專業焦慮

攝影記者面對許多與自身價值觀相衝突的新聞時產生專業焦慮，這不僅是腥煽色的價值判斷，還有是否違背新聞倫理的專業價值。D4 坦言為保有工作權硬著頭皮去偷拍，過程中不斷調適自己對記者角色與工作的認知，信任長官的指揮調派去執行任務。

但《蘋果日報》卻只要直觀式的攝影，有時甚至扭曲拍攝者的原意。攝影記者 C2 表示並不是呈堂證供的照片不重要，而是許多攝影記者會期望用視覺性的思考及表現手法突顯新聞事件的精髓，進而期待具主觀意義的照片能引起讀者的共鳴，擺脫被工具化的角色。

當民生消費新聞當道後，報社必須借重攝影記者的長才。不論是安排的影劇新聞或建構的消費新聞，工作認同逐漸轉換為商業或人像攝影師。這對專責跑線的攝影記者來說，至少可以擺脫專業倫理下的記者責任。

在媒體產業環境的變動下，攝影記者因著不同報社的組織分工而有不同程度專業轉換的認同焦慮。B2 指出消費新聞與一般新聞的認同差異，這種差異更會加深真實的專業倫理擺盪在不同的範疇裡：

一個是用影像捕捉，不能安排與造假；一個是要去激盪你的創意，把你看到美，或是好吃，或是更好的一面傳達出來，這是截然不同的世界（B2／筆者訪談稿整理，2008年10月8日）。

「真實」捕捉或「創意」建構的影像，是攝影記者自我成就感與專

業定位的不同來源。這對於不分線的攝影記者來說更須自我調適。

所以，攝影記者對真實影像的看法因不同採訪路線的場域位置而異，受到其他參考團體（例如同業、同僚、管理階層等）對專業或工作倫理價值評判的影響。媒體經營者藉由操弄專業倫理論述，使攝影記者在眼見為憑意識型態下的知識／權力結構中，會有真實之為正義、或是真實之為利益的矛盾、緊張關係，進而產生對專業認同的焦慮。雖然不斷的說服自己改變真實的政治界線，仍會因而衍生不同程度的工作認同與專業主義。

三、專業主義與工作認同

攝影記者的專業主義是由自我認同、以及專業與外在環境互動下產生的結果。攝影記者依據自身的位置進行場域鬥爭，為自己尋求最大的利益。工人或專業者的身份會不時擺盪在場域內的不同位置，形成漂移的工作認同。

（一）工作倫理或專業倫理

許多攝影記者以新聞專業倫理為信念來表述自己作為專業勞動者。但這樣的信念掩蓋不了被商業媒體支配、剝削的事實。攝影記者無法自我選擇新聞；揭弊與伸張正義的新聞可遇不可求；反而八卦緋聞、人為操控的新聞，充斥在每天的趕新聞過程。正如 Gramsci (1971: 333) 所說的「意識的矛盾狀態」，蔓延在攝影記者群體之間。

報禁解除後的大報，工作倫理凌駕專業倫理；實做中的社會權力關係大多令攝影記者受挫。慢慢有些攝影記者開始專注經營某些採訪人脈，進行藝術創作或接 case，以此累積業外的資本。攝影記者的新聞專

業認同，對於不同世代與年資的人，有不同程度的內涵。

《蘋果日報》進來台灣後將新聞資訊全面商品化。D1 表示蘋果就是強迫你去接受很寫實、赤裸裸的文化；認為讀者愛看就有市場，獨家影像更讓其他媒體跟進報導，提高市場價值。這樣的工作認同讓攝影記者付出更大勞動異化的代價，洗腦下的結果認同新聞影像的商業意義。

攝影記者的專業意識與工作認同，成了一種不斷論證與商討的範疇。商業媒體運用專業倫理轉化為工作倫理的方式，正如 Foucault (1988: 162) 的觀點，「知識／權力」的運作不需要主體有意識的參與，而是知識對主體的運作方式所產生的權力效用。媒體科層組織運用工作紀律、攝影記者的養成訓練、與數位科技等監視方式，透過權威的編輯台規範攝影記者的行動並考核是否遵守。社會傳承下來的專業倫理在這套機制下不斷被轉化成為工作倫理。造成許多攝影記者對專業倫理與工作倫理的認知十分模糊，也分不清界線，更遑論身為新聞專業者所應承擔的社會責任。趕新聞遊戲最終只是生活糊口的工作。

(二) 是工人，還是專業者？

昔日的攝影記者會秉持敬業精神服膺勞動體制的規訓，承受精神壓力與沉重的體力負荷，工作永遠排生活的第一順位。這樣的工作態度讓專業者的意識大於勞動意識，但管理階層打造的技術／權力關係網絡增強純勞動意識。以至於有一些人選擇離開這個行業；有一些人選擇混口飯吃；另一些人偶有反抗卻會向現實妥協讓步；這些工作心態不斷交叉相疊，讓攝影記者繼續待在勞動體制內。

此外，在許多有經濟價值的共構採訪生態，專業的價值明顯成為商業利益的交換價值、及社會關係下的鬥爭籌碼。

嗯，其實就是騙錢，真的啊，就像是藝人身旁的這些人來講，對我而言就是騙錢，一個化妝髮型收你二、三萬元，真的那麼好賺嗎，我們常常報那個價。……我現在領的就是公司的薪水而已，如果是接 case 也沒像他們那麼好賺，那都是太過分了（D2／筆者訪談稿整理，2008 年 9 月 9 日）。

但此類新聞路線的工作認同已不是記者職業。工作認同從攝影記者轉到攝影師，以別人認可的專業主義在環境中求生存。

所以面對媒體營收不斷下滑的經營困境；攝影記者可以粗略分為兩種生存心態。第一，有些專責跑線的攝影記者，反而會去經營某些採訪路線，不僅為自己累積資本，也嘗試職涯轉型的機會；這種專業者的意識卻會遇上影像真實再現的政治權力關係，要定位專業者的位置，無法迴避被支配的專業勞動者權益問題。第二，對不分線的攝影記者而言，漂移的專業意識與工作認同無助攝影記者個人轉型的需求，也得不到採訪對象的肯認，不利攝影記者的資本積累與階級位置的改變，卻有利經營管理者規訓攝影記者，徒增攝影記者的專業焦慮。要談攝影記者的專業之前，無可迴避實踐專業所該爭取的勞動權益。

伍、結論

Burawoy（1979／林宗弘等譯，2005）指出，資本主義式勞動過程有其相對自主性及所獨具的變遷的動力，使勞動者對於原本是宰制他們的資本主義制度心甘情願的順服。台灣媒體因民主化歷程，靠市民社會的力量掙脫政治力的掌控，走上自由主義下的報業競爭。媒體積極擔負

起輿論議題的領導角色，宛如民意的傳達者與領導者，監督國家施政與維護公眾利益。媒體從業者的權力由此而來。這種論述一直是台灣媒體發展的主流論述，賦予媒體從業者崇高的專業使命感。商業媒體趁虛而入。新聞的市場利益會讓媒體工人產生商業邏輯與新聞邏輯的產製矛盾。商業媒體以「發行量」與「閱報率」的市場利益，改變媒體工人的價值觀與其相對應的社會責任；靠工作倫理不斷轉化專業倫理，保持媒體工人的生產效率。攝影記者反抗的能動性，因專業倫理價值的改變，轉而展現不同的專業主義維護自身利益。生產關係在這過程中被改變。勞動者迎合商業媒體的營利思維，順服於資本主義生產體制。

商業媒體只是將媒體的社會公器視為維護創造自身利益的工具，並將自身的盈虧利益與媒體工人的工作權綁在一起，動輒以減薪裁員的人力檢討恐嚇員工。所以，台灣媒體產業的發展早就偏離專業倫理的基本價值。理想的專業倫理實踐必須要有相應的社會條件或內涵，才有可能存在。

註釋

- 1 台灣新聞記者協會（1996）。《台灣記協新聞倫理公約》。上網日期 2008 年 9 月 9 日，取自 <http://www.atj.org.tw/old/ethic.htm>
- 2 Bourdieu（1983, 1993）提出「場域」（field）、「生存心態」（habitus）與「資本」（capital）等核心概念。居處產製結構中的勞動者，一方面根據個人成長歷程中所形成的生存心態，另一方面也會根據當時他在場域中所處位置來進行最有利的考量。生存心態乃個人無意識內化社會結構的結果，也是社會結構與實際行動間的媒介。場域則為一個交織各種力量與位置關係的社會空間。資本則包含了經濟資本、文化資本、象徵資本與社會資本四種類型。其中經濟資本係指可立即、直接轉換成金錢的財產；文化資本指語言、意義、思考、行為模式、價值與教養；社會資本借助於所佔據的持續社會關係網絡所掌握的資源或財富；象徵資本是對社會世界的理解、認知、甚至指稱、界定的能力，包

- 含名望、地位、權威及穿著、打扮及談吐等能力。基本上，經濟資本乃文化、社會、象徵等資本的根基，也是其他資本鬥爭轉換的標的（林富美，2006）。
- 3 換喻（metonymy）就是用一種事物的部分特徵或相關的特性來代替此事物（張錯，2005）。例如照片是以瞬間的影像來說明某一新聞事件。隱喻（metaphor）意味著一個符徵被另一個符徵給取代；也就是隱喻涉及將一個符徵應用到一個指示物上，且就一般而言或字面意義而言，是不會如此應用的（Barker, 2004 / 許夢芸譯，2007）。通常一張「直觀式」與「意境式」的攝影手法都具有換喻的意義；「意境式」的影像會給人較抽象之感，其隱喻性高於「直觀式」的影像。
 - 4 《蘋果日報》各部門主管必須對自己負責的新聞內容提出報告，讓其他主管檢視並質疑該新聞品質是否符合市場利益。這樣的機制讓每個主管神經緊繃，並被要求隔天立即改進。其意義就是隨時調整組織的生產效率，產製最符合市場價值的新聞商品（筆者訪談稿整理，2009 年 3 月 2 日）。

參考書目

- 台灣新聞記者協會（1996）。《台灣記協新聞倫理公約》。上網日期 2008 年 9 月 9 日，取自 <http://www.atj.org.tw/old/ethic.htm>
- 林宗弘、張烽益、鄭力軒、沈倬如、王鼎傑、周文仁等譯（2005）。《製造甘願》。台北：群學。（原書 Burawoy, M. [1979]. *Manufacturing consent: Changes in the labor process under monopoly capital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林崇熙（2004）。〈技術物有政治性嗎？〉，吳嘉苓、傅大為、雷祥麟（編），《科技渴望社會》，頁 123-150。台北：群學。
- 林富美（2006）。《台灣新聞工作者與藝人——解析市場經濟下的文化勞動》。台北：秀威。
- 張源銘、張文輝（2004 年 10 月 26 日）。〈最後一瞥平宗正 先推同業上救生艇〉，《聯合報》。上網日期 2008 年 9 月 9 日，取自 <http://udndata.com/ndapp/>
- 張錯（2005）。《西洋文學術語手冊》。台北：書林。
- 許夢芸譯（2007）。《文化研究智典》。台北：韋伯。（原書 Barker, C. [2004]. *The sage dictionary of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Sage.）
- 許靜怡（2002）。《攝影記者在台灣——專業路漫漫》。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 黃義書（2004）。《新聞產製場域中的攝影記者——認知、角色、專業權力及生存心

- 態分析》。世新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 劉仲冬 (2003)。〈當醫院變成傳染窩〉，《當代》，193: 106-117。
- 鍾宜杰 (2006)。《舞影者：台灣戰後攝影記者習癖與品味的形構》。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 韓連慶、曹觀法譯 (2005)。《技術批判理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原書 Feenberg, A. [2002]. *Transforming technology: A critical theory revisited*.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ecker, K. (1991). To control our image: Photojournalists and new technology. *Media, Culture & Society*, 13, 381-397.
- Bourdieu, P. (1993). *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 Bourdieu, P. (1983). The form of capital. In J. G. Richardsin (Ed.),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 Braverman, H. (1974). *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 Foucault, M. (1988) .The political technology of individuals. In L. H. Martin, H. Gutman & P. H. Hutton (Eds.), *Technologies of the self: A seminar with M. Foucault* (pp. 145-62). Amherst, MA: 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 Gramsci, A. (1971)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 Liu, C. D. (2006). De-skilling effects on journalists: ICTs and the labour process of Taiwanese newspaper reporters. *Canad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1, 695-714.

附錄一

表一：受訪者資料表

報別	代號	年資	背景
聯合報	A1	6 年	主跑過政治、財經、市聞、民生消費等新聞
聯合報	A2	5 年	主跑過影劇、消費等新聞
聯合報	A3	27 年	主跑過政治、財經、市聞、民生消費、體育、影劇等新聞
聯合報	A4	5 年	主跑體育、市聞等新聞
聯合報	A5	14 年	主跑過社會、體育、生活消費、政治等新聞
中國時報	B1	15 年	主跑過政治、財經、市聞、民生消費等新聞
中國時報	B2	10 年	主跑過政治、財經、消費等新聞
中國時報	B3	6 年	主跑影劇等新聞
自由時報	C1	8 年	主跑過政治、財經、體育等新聞
自由時報	C2	11 年	主跑過政治、財經、市聞、民生消費等新聞
自由時報	C3	4 年	主跑過社會、生活消費等新聞
蘋果日報	D1	10 年	主跑過政治、影劇、體育等新聞
蘋果日報	D2	10 年	主跑影劇娛樂新聞
蘋果日報	D3	19 年	主跑過政治、財經等新聞
蘋果日報	D4	16 年	主跑過政治、財經、市聞、民生消費等新聞
蘋果日報	D5	14 年	主跑過政治、財經、市聞、體育等新聞
蘋果日報	D6	14 年	主跑過社會、政治、財經、市聞、民生消費等新聞

The “Reality” under News Making: Working Conditions and Professional Anxiety of Photojournalists

Chung-Hung Pan*

ABSTRACT

This study primarily focuses on the labor process of photojournalists by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nd in-depth interviews to analyze photojournalists' working conditions and professional ethics after the newspapers embargo had been relieved.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journalism ethics was falling along with the news commercialization, and it has caused photojournalists to lose professional independence, and to sway between the identity of being the workers or the professionals. By analyzing the photojournalists' labor process, it has been found that the professional workers' values were merely based on the value of business interests. According to this reality, it may be causing further oppression and exploitation of the professional workers, if there is no corresponding working conditions to safeguard the professionals.

Keywords: labor process, photojournalist, professionalism, professional ethics, work ethics

* Chung-hung Pan is a photojournalist at the United Daily News Group, Taiwan.

• 新聞學研究 • 第一〇五期 2010 年 10 月